

綠竹水南集

當·代·著·名·學·者·自·選·集



兰州大学出版社

陳鐵健卷

陈铁健卷



此五七八年以來旧作之结集也

可  
靜  
鑒  
於  
星  
兩  
點

陳  
鐵  
健  
記

癸未大暑



綠竹水南集

当·代·著·名·学·者·自·选·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著名学者自选集·陈铁健卷:绿竹水南集/陈铁  
健著.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2

ISBN 7-311-02083-2

I . 当... II . 陈... III . ①社会科学—文集②陈铁  
健—文集③中国—现代史—文集 IV .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1095 号

**当代著名学者自选集·陈铁健卷**

**绿 竹 水 南 集**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市天水路 308 号 电话:8617156 邮编:730000

E-mail: press@onbook.com.cn

<http://www.onbook.com.cn>

---

兰州市残联福利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5

---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343 千字 印数: 1~5000 册

---

ISBN7-311-02083-2 全套定价: 180.00 元  
(共十册)

## “丛书”总序

---

兰州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张克非先生对我说，要为六十岁以上、七十岁左右具有真才实学的学者，出版一套人文社会科学论著自选集。其中，史学类要我帮忙编选十卷一辑。我想，这可能有两个理由：第一，是八十岁上下的大学者，多有出版家为他们周密策划出书事宜。有的大学者的文集、文选不知重复出版了多少套，而六七十岁的少名或无名的“青年老头”却少有人来问津。说穿了是因为后者的著作不能为出版者赚钱，甚至还要蚀本。第二，是有官衔的“学者”，因为有权势在手，不管他有学问没学问，也有办法（例如用公款支付出版费用，甚至公然买书号）令出版社为自己出文集、文选。据我所知，某些“长”字号的此类书籍，就是这样堂而皇之地出版的。即使没有人买没有人读，他们也会巍然送人，到处张扬。这两条理由，不知道克非先生是否认同，反正我是这样想的。

兰州大学出版社的盛情，令我感动和钦佩，因而不辞自身学养之浅陋，当即答应为他们选荐作者。出版社的标准就是我的选荐标准：只问学问，不问官职；只选六十至七十岁之间或略大于

七十岁的学者。这时，我不由想起季羡林先生的一篇文章中说过的一段话：

人文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和技术是有很大不同的。科学技术专家，一到六七十岁退休的年龄，有的耳有点不聪，有的目有点不明，难以再进实验室，拿手术刀手也发颤，只好退而且休了。而人文社会科学家，则到了这样的年龄却是如日中天，正是读书写作的大好时候。即使耳目有点小毛病，甚至大毛病，也无大碍。此时，他们书读得越来越多了，知人论事的能力越来越强了，通古今之变的本领越来越高了，究天人之际的愿望越来越旺了，即使遵章退休，也往往是退而不休。

我完全赞同季老的高论，且有所补充。照我看，中国的六七十岁的人文社会科学家，大多在人生和学术道路上坎坷多难，饱经风雨沧桑，不乏伤心切肤之痛。然而，他们从未颓唐不振，反而因为心灵深处拥有忧患意识，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独立思考和敢于重新评估一切的怀疑精神，使他们晚年生活追求中始终不曾忘却对人文社会科学尽自己一份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责任。他们虽面对权威和虚假，却甘于清贫和寂寞，以信念、醒悟和批评，诉求真实，尊重歧异，鄙弃教条，质疑权威，敢于应对非学术因素干扰下学术领域的种种挑战。

我的专业是研究 1840 年以后中国近代史，所知只有一百多年的史事，而对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史则知之甚少。不负所托，为了审慎地选荐丛书各卷作者，我便向这两个学科的专家和老朋友请教。世界史，我请教于苏俄史专家陈之骅先生；中国古代史，我请教于明史专家王春瑜先生。之骅谦虚地说他自己的文章暂时没有时间整理，他诚恳地推荐英国史专家王章辉先生，王先生欣然俯允。春瑜除承诺自编一卷外，又热心推荐汉唐史专家张泽咸

先生、宋辽金史专家王曾瑜先生，张、王两先生亦积极响应。中国近现代史方面，我敦请王桧林、张注洪、马连儒、唐宝林四位先生予以支持。桧林先生以主编《中国现代史》（高校教科书）、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抗日战争史而名满学界。注洪先生以研究中国现代史料学与信息学而著称。马连儒编审主持《人物》杂志多年，对中国现代历史人物研究既深且精。唐宝林研究员近二十年间以研究陈独秀和托派历史知名于海内外。在以上八位先生的选荐过程中，我始终在寻找马大正先生。他是边疆史地和少数民族史专家，我虽不研究边疆史地，但一向关注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大正其时正在新疆考察，直到一个月后才联通敲定。

九位先生中，六位是旧雨，三位是新朋且从未见面。他们的研究领域涵盖汉、唐、宋、辽、金、明、清、民国，边疆少数民族史和英国史诸学科。我稟性愚鲁，才疏学浅，对上述许多领域相当外行，不敢妄评诸公学术成果，但据平时涉猎，参照学界品评，我深信他们都是各自学科中的一流学者。在近二十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进程中，他们以其非凡的学术成果为本学科作出了独特的有些是无可替代的学术贡献。这种贡献的深层意义，在于他们摆脱了长期流行并主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二元思维定势”，即非好即坏、非美即丑、非善即恶的简单化绝对化的思维方式。对于他们的研究成果，人们可以见仁见智，乐山乐水，可以提出种种批评见解，但在学德和文品上，他们绝不会愧对广大读者，这就是：

——历史家的第一品格是真诚，是无所禁忌，秉笔直书，而非附庸政治的奴婢。

——历史学的第一标准是真实，是信史，是史镜，而非“胜利者的宣传”。

我坚信，这应当是时下和未来历史学主体和客体的正确的发

展方向。这也是高悬于我和所有作者面前的崇高的目标，追求之心不敢稍懈。

陈铁健

壬午谷雨后四日，京东亮马河畔水南斋

## 自序

---

北京东直门外胡家园十五号楼三层，北窗开阔，面对着五十米外的亮马河。河对岸是一片绿荫下的农家平房。在亮马河水之南的这个居所，我一住就已十五年。从1987年秋迁入始，书房便由原住城内弓弦胡同八号寓所的“绿竹书屋”改作“水南斋”。绿竹书屋，得名于弓弦寓所窗前满布着我莳养的罗汉竹、青竹、翠竹、观音竹、墨竹等大小盆栽为主兼有其它花卉的那个狭长的小院。绿竹的劲节、虚心、生机盎然，至今不能忘怀。我在那里从1965年住到1987年，整整二十二年。其间有被“文革”乱世浪费的十年，也有改革开放初期发奋弥补的十年。《重评〈多余的话〉》、《瞿秋白传》、《论西路军》等，都写于此期。1987年后所写蒋介石、陈独秀、王希天、黎澍诸文，史学随笔杂感，以及所编《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12卷）等，皆成稿于水南斋。本书名曰《绿竹水南集》，盖源于此。

文史不分家，自古已然。我是一个历史癖，也是一个文学癖。两者相较，文学癖曾经重于历史癖。1942年，小学二年级，我从父母亲的书柜里找到一本《江湖奇侠传》，从此嗜读武侠小说，一发不可收。寒暑假时多与长我三岁的舅舅厮守嬉戏。舅舅

不喜欢读书，外祖母便叫我从书摊租来武侠小说，每天给她念个把钟点，那是她在操持家务的忙碌中最安详适意的时刻。夜晚入睡前，躺在被窝里，紧挨着外祖父听他讲《三国》、《水浒》和《封神》故事，兴未尽，已入梦。每天一段，数十天的假期，可以听完一两部书。此后，在与舅舅游戏中，便增加了“战马操”、“伐东吴”等追逐争斗的场面。初中时，我先后读过两地三校，除在校内图书馆借阅文学书籍，还到市区图书馆找书读，有时放学后跑到书店站在书架前读到关店时。《万有文库》的不少书，就是在一家旧书店里这样读完的。父亲一度在书店做事，他经常把新书拿回家我包好书皮连夜读完，第二天他再送回书店。每逢暑假，父亲会从他机关图书室借一批中外文学作品，供我假期阅读。1950年暑假，我读过的俄国古典文学和苏联文学作品，大抵都有读书札记。这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寒假之前我已考入高中，但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氛围中，与大多数同学一样，我也报名参军，被分配到准军事性的政法部门学习、工作凡五年，直到1955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五年中所读之书，历史学著作始终居于前列，这是我进入史学之门的初步。

涉世日深，所遭遇的现实种种困惑，没有人能够做出令我满意的回答，只好向书本讨教。在作家编织的故事中，或史家撰写的史籍中索解求证。于是，经史子集，古今说部，都找来浏览。虽则“好读书而不求甚解”，却使我从爱好文学转而钟爱史学，从欣赏文学的浪漫张扬转入对史学严谨真实的追求。读史愈多，研史愈久，愈益感知史学令人清醒通澈，不甘于愚昧盲从。心中悬有史镜，以古人前人之行事烛照今人之行事，听其言复观其行，便不会轻易受舆论误导，不会为一己私利而趋从权威，不会人云亦云而忘记独立思考。

1958年，大学三年级结束时，吉林省新设历史研究所，从

我们年级调去几位同学，张旋如、田钖国和我都在其内。1958年—1961年，我被分配研究中共满洲省委和东北抗日联军历史。先后在哈尔滨、大连、北京等地访录当事人和知情者，如周保中、冯仲云、刘澜波、李实、赵毅敏、何成湘、马辉之、钟子云、冯弦、王效明……在中央档案馆复制满洲省委文件，阅抄日伪战犯案卷。三年中所接触的人物和资料，使我对地处东北一隅的中共党组织和抗日联军的艰苦奋斗业绩有所了解，也对东北党内和抗日联军内激烈残酷的内斗深感震惊，许多精英不牺牲于对敌斗争而死于无休止的党内军内的自相残杀。后来当我研究瞿秋白等中共领导人在党内被整肃的遭遇时，我便逐渐形成了一个牢固的观念：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未必你死我活（大汉奸、大战犯可受礼遇，可为高官，即为一证），而所谓党内路线斗争有时却残酷到必置对手于死地而后止（博古临时中央之对瞿秋白，西路军败后延安中央之对李特、黄超，“文革”时期党主席之对国家主席，等等）。也许可以说，这是研习历史给我带来的启示。

1961年冬季，我在北京西郊温泉中央档案馆，日夜阅抄日伪战犯案卷。每逢周末，在近代史所进修的学友李义彬都邀我进城小聚。他住在东厂胡同一号原黎（元洪）大德堂东山八角亭。两张办公桌拼在一起就是我的临时客床。何干之、李新、孙思白、陈旭麓、彭明都在亭畔一排平房中设有工作室。活跃健谈待人亲切的彭明先生，不时到八角亭聊天。他说编书需人，建议我来边进修边做事。我征得吉林历史所佟冬、万九河两位所长同意，1962年2月底即来北京进修。李新师正在助吴老玉章撰写回忆录，要我为他收集历史背景资料。半年过后，李新师建议我报考他的研究生，但考取之后，吉林方面坚不放人。那时粮油管制甚严，无户口即无油票供应，食堂拒绝入伙。从9月到12月

间，我买了一张公交车月票，午、晚两餐几乎跑遍周围十里方圆的饭铺，以当时食界仅有的咸菜炒黄豆、无油青菜汤和黑面火烧充饥。义彬每月购物本上仅有二两熟肉，总是由我和他分享，一两肉两口便吞下去，尚不知肉味为何。苦则苦矣，精神上却是愉悦的。近代史所的丰富藏书和学术氛围，编书组诸位师长的深厚学识和谆谆善诱，使我如坐春风，日有长进。这种美好的岁月，一直延续到1964年秋天，远赴张掖参加“四清”运动之前。其间，虽有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喧嚣，但对在良好的小环境中闭门读书的我来说，可以充耳不闻，我行我素。只是在戚本禹著文恶意攻击罗尔纲先生的李秀成自述研究的论著后，我以打抱不平的心理，向《光明日报》投寄一篇长文反驳戚氏谬论。此文加上1966年所写《胡适吴晗通信评注》一案，被“文革”中夺权的造反派大作文章，把我列入“清理阶级队伍”名单，并向政法部门送上一纸诉状，给我戴上“孝子贤孙”、“保皇派”、“反对陈伯达”等等罪名。如果不是他们很快垮台，我是要被“清理”一番的。

从青年到中年，悠悠沧桑之变中，我先是受益于大学时期的李时岳先生。他以其对于中国近代史教学研究中的违抗流俗的见解，使我从大学毕业后能够不囿于流行的理论观点，而注重观察历史真相。随后，我更受益于研究生时期的导师李新先生，和虽非直接授业却对我热心关照具体指导的黎澍先生。李新师是从四川走出的学生领袖，经历过延安时代，穿过军装打过游击的老革命兼教授，而湖南籍的黎澍师则是身着西装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地下革命斗争的文化战士和学者。他们两人共同的人生信条是：斥教条，去盲从，反专制，争民主，倡言改革开放，崇尚自由独立。他们清贫一生，不为名利所惑，不为权威所屈，敢想、敢言、敢作、敢为。我以有这样的师长，而心存自豪，无比荣

幸。我也试图以他们的言行为楷模，身体力行，并且自信学有所用。我于1958年起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为职守，吃史学饭四十余年，所写文字均不离史事、史人、史论，而以写真实的事与真实的人为主旨。素来与理论隔膜，对数十年间变幻莫测的理论风云往往敬而远之。窃以为史学重实证，没有理论，历史照样可以留存，而没有真正的史实，再高妙的理论也无济于事，只能束之高阁。2000年辞世的艺术史家、牛津大学教授、欧洲科学院院士哈斯克尔讲过同样意思的话，可我读到他的言论已是2001年，也许可以说是“所见略同”吧。

史学不以理论为重，却不能拒绝思索；思索，在我们这个社会尤其重要。富有活力的思想是史学进步的动力，而理论往往冻结思想的活力使之僵化，成为史学进步的障碍。专制者要人们迷信，而压制人们思索；被专制者因性格扭曲，而不善于甚至不敢于思索。抑塞不拔，噤若寒蝉，动辄得咎，心存恐惧，是已逝去的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特征。然而，知识分子总是要思索，要探究，不肯在屈辱和无奈中神亡心死。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此人皆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幼时在日本人统治下的东北，童稚未脱，看到小朋友玩的图片中有身背大刀的中国士兵站在长城上吹起号角，我不能不问母亲：我们是“满洲国”国民吗？母亲悄声的回答，使我知道我们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50年代初，对“老大哥”苏联颂声不斷时，我总忘不了1945年光复后苏联军队在东北地区的种种丑行。其后，当我被批评对“右派分子”温情、右倾，不得不紧跟反右时，我总在想那位战略家的“阳谋”是高明还是可鄙？当几千万中国人被人为的大饥馑变成饿殍之时，我不能不怀疑那些操纵亿万人命运的高官的治国能力。在我心中，曾经感动过我的那个“战无不胜”的神话，已经不攻自破。当“文革”灾难降临到

每一个善良的中国人头上，数千年积累的文明遗产、文化宝藏被砸烂烧毁的时候，你还会相信它的发动者所说的每一句话吗？

我还记得，1953年斯大林逝世，当夜空中哀乐弥漫时，许多人动情地流下眼泪；到1956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传出，在不少人心目中斯大林已成为令人毛骨悚然的形象。经过多少次这样的心灵震颤，人们能不重新思索？所以，当某位把折腾中国人视为天经地义造成种种本来不应出现的巨大灾难的伟人逝世，许多人不再为他流泪。他的遗骸留置处，虽然巍峨崇高，也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乐意前往顶礼膜拜的了。历史是最好的教师，它会让人看清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只有到这个时候，人们才会真正感悟，趋于理性，才会摆脱迷信，拒绝盲从，独立思考，不为党派所囿，不为教条所惑，不为权势所屈。

当然，理性不是万能的。中国的实用理性思维，成就了二十世纪上半叶革命盛行并取得革命胜利的宏大庆典；而在此后的三十年间，在自视为终极真理的指挥下，在非白即黑的简单化思维方式的误导下，中国人所饱受的人间苦难、思想压抑、精神屈辱，绝不小于上半个世纪。仅仅“文革”十年，就是史无前例的浩劫，遑论其它？近二十年在力求实现现代化并在物质现代化方面取得相当成就的同时，在文化现代化方面却不能不承继政治革命思想过分发达，人文思想相当贫乏和苍白的事实。在下的文章，自然不能免俗，不无贫乏与苍白的影子。中国人特别是文化人（包括我自己）要在新世纪重振科学精神保持学术真诚，还要付出不小的努力。

屈指算来，再过两年，在下就将年满七十岁。号称古稀，实则今天看来不过是还能折腾一阵子的“青年老头”。倘不生意外，且手可动，脑可思，生活闲适，心情沉稳，在下将会继续爬格子。不囿于环境，不看人脸色，力戒附庸趋时，扫尽贫乏苍白，

写自己想写、乐意写的文字，日有所读，月有所写，岁有所成，则于愿足矣。

壬午春正初十，序于北京亮马河畔水南斋

## 目 录

---

“丛书”总序	1
自序	1
北伐漫议	1
遵义会议述论	
——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	15
论西路军	28
宜将直笔写西征	50
西安事变简论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读后	61
历史功罪向谁论	102
皖南事变五十年祭	115
抗日战争史研究小议	120

最后的觉醒	
——抗日战争时期的陈独秀	123
尘封半个世纪的“五四”先驱王希天	155
重评《多余的话》	177
《多余的话》两段佚文	197
瞿秋白绝命诗考	204
《瞿秋白传》后记	212
人格的魅力	
——瞿秋白与张太雷	218
短暂的交谊	
——瞿秋白与胡适	226
历史的沧桑	
——瞿秋白与蒋介石	242
清明夜思	263
附：王观泉来信	
瞿秋白研究通信选	266
陈铁健致茅盾(三件)	
茅盾致陈铁健(二件)	
丁玲致陈铁健(一件)	
王学的历史及其现代命运	274
俗文化中的蒋介石	292
蒋介石骗了孙中山？	
——蒋孙关系新论	313
跋《蒋介石与中国文化》	330
序《蒋家王朝》	333
出新的《晚清政治革命新论》	337
评《蔡元培传》	341

评《汪精卫传》	351
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职官人物志》	356
历史家的品格	
——记黎澍师	358
黎澍先生十年祭	378
李时岳师	384
尘凡多变敢求真	
——胡绳先生印象	390
神化杂谈	
鬼术杂识	395
游民文化值得研究	404
门外文谈	407
去禁忌讲真话	413
论争文风三议	420
真诚的史家 真实的历史	425
请尊重历史	430
听之而已 信则未必	
——《听叶剑英谈西安事变中的张学良》读后	433
后记	440